

□ 吴道镔 陈健

两列连绵的青山之间,坦洋溪在静静流淌。溪畔两侧,依山而建的房屋呈狭长分布。站在流池坪山上栈道俯望,坦洋村形似一叶龙舟,顺着由高及低的地势,宛如随时竞渡的姿态。

3600亩茶山环绕的坦洋,一片绿叶,维系着全村家家户户的日常营生,百年如是。福建“闽红三大工夫”之一的坦洋工夫红茶就出自这个村落。

—

茶叶自1783年始就已经在福安广为种植,清乾隆四十八年编修的《福安县志》记载:“茶,山园皆有。”证明当时福安产茶区分布广且多。

早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坦洋村就已经有人在菜园四周种植茶叶,当地人就叫“坦洋菜茶”,适合制作红茶、绿茶。所制作的红茶香高味浓,“坦洋工夫,香飘四海”是周恩来总理对坦洋工夫红茶的赞誉。

1851年,坦洋村“万兴隆”茶行老板胡四福以当地的坦洋菜茶为原料,引入了武夷山的小种红茶制法。因试制此茶颇费工夫,参与研制的众茶商商议出“坦洋工夫”品名。坦洋工夫红茶一投入市场,便广受欢迎,更有“英商购买华茶,以坦洋出产为最”的记载。

“茶季到,千家闹,茶袋铺路当床倒。街灯十里亮天光,戏班连台唱通宵。上街过下街,新衣断线头,白银用斗量,船泊清风桥。”朗朗上口的民谣描绘的就是当时坦洋茶业的盛景。

今年59岁的刘智勇是土生土长的坦洋人,“我记得小时候村里还有两座欧风格的建筑,老人说,那是清代茶商为接待外国客商而特意建的。”

下街15号,从石阶拾级而上,依序是上书“武魁”两字的住宅、彼时用于茶叶交易的大厅、生产茶叶的横楼。这组黄墙黑瓦的土木建筑已近150年,为茶商施光凌所建,是丰泰隆茶行旧址。横楼三层,每层11开间,为制茶工场,也是坦洋村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早期红茶制作工场。

横楼地处村庄的高处,凭窗远望,村庄大部分建筑、景色尽收眼里。遥想当年收茶时节,施光凌在此目睹千米长街的熙熙攘攘,心里该是怎样的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宁德飞鸾岭南路的起步岭是晚清时期的闽东北海丝茶路,保存完好的两块石碑,记载着清光绪时期茶道修建的始末,宁德、福安、寿宁等地茶商捐资的数目。水陆兼程、人力肩挑的茶叶出口之路延续到1899年三都澳港口开埠。

清同治五年(1866年),福建省在坦洋村设立茶税局,足见当时坦洋茶叶市场规模。1881年至1938年,坦洋工夫年均出口超500吨,最鼎盛时期的1881年,福安县茶叶出口7万箱(约2100吨),占福建省总量的十分之一。

1915年,漂洋过海的坦洋工夫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抗日战争爆发后,海上茶路受阻,以出口为主的坦洋工夫红茶就此失去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辉煌。新中国成立后,福安茶区“红(茶)改绿(茶)”,这一改就是30余年,坦洋工夫红茶仅保留少量生产。

二

坦洋上街,一座百年老屋的门口,一



阮佳艺 摄



陈柳金 摄

名老嫗正在打扫地上的杂物。“这栋房子有两百多年了。”老嫗邀请我们进屋,“天气太热了,喝口茶吧。”

老嫗名叫苏石莲,已经81岁了,衣着整洁,话语轻柔。小包装的茶袋是用小剪刀斜着剪开的,家里的厨房、房间被她收拾得有条不紊。

大儿子离婚后去了福安做工,二儿子因病早逝,一人独居的苏石莲领着低保金,依然精心维护着这个家的整洁。面对苦难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儒家视茶为修身养性方式,或者是茶乡的浸染所致,我对苏石莲肃然起敬。

刘少如的命运与苏石莲并无二致,幼小就失去了双亲,工作中又屡屡受挫。1978年,个头瘦小的刘少如再回到坦洋任村委会主任时,已经50岁了。

刘智勇说:“父亲是个有雄心的人。”当过村党支部书记,如今又回来担任村委会主任的刘少如知道:坦洋人的生计离不开一片茶叶,重振坦洋工夫成了他的“老年”壮志。坦洋村的山头又绿了,茶叶开始收成的季节,茶厂终于又开工了。

命运多舛,1984年开春,茶叶收购价格暴跌,茶厂积压了数千担茶叶。刘少如十分不解,多处询问,怎么也找不到价格暴跌的答案。鼓动着全村复垦茶园的是自己,还没几年却又走入了绝境。刘少如不相信命运如此不公,决定亲自寻找答案。雇了一辆货车,装了几十担茶叶,刘少如直

奔上海。“如果卖不出去,茶叶直接倒入黄浦江,自己一路乞讨回来。”

天无绝人之路,奇迹发生了,刘少如的一车茶叶被抢购一空,卖了8000多元。不少茶商得知刘少如来自福建坦洋,争着要和他签订购销合同。

刘少如想创办一家公司,也方便与客商签合同。当时的茶叶实行的是统购统销,刘少如办公司的努力自然四处碰壁。刘少如直接上福州找到了时任省农业厅厅长林桂镫,林桂镫曾任设立社口镇的省农科所茶叶所所长,也是一名茶叶专家。林桂镫不仅支持刘少如办企业的想法,同时安排刘少如与下属的富民公司接洽,企业还没批下来,刘少如就以坦洋工夫茶叶公司的名义与富民公司签订了购销1500担茶叶和贷款60万元的合同。

回到福安,刘少如找到了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给他看了与富民公司签订的合同,副县长正愁着全县几十万担茶叶的销路,在刘少如的申办企业报告上作了批示。

1984年10月,福建福安坦洋工夫茶叶公司在坦洋成立。此时的刘少如一如施光凌的踌躇满志:“从明年起,大家有多少茶叶,公司全包下来,我保证不压等、不压价!”

1985年,茶叶购销体制改革,不再由国有企业统购统销。这一年,公司赚了10万元。

1986年,茶叶公司从祠堂搬到了三层新楼,盈利20万元。

1988年,刘少如任村委会主任的第十年,坦洋村人均收入从180元上升到850元,超过半数的户均收入超千元。村集体资产超百万元。

1989年2月23日,在宁德地区农民“话改革,讲形势”报告会上,作为上台发言的农民企业家之一,刘少如第一个讲述了坦洋村一叶茶叶的创业故事。宁德地委提出:闽东学“三洋”,坦洋要当“领头羊”。

1991年,坦洋村成为省级文明村,村集体资产超过300万元,成为闽东的明星村。

三

元代杨文奎在《儿女团圆》一诗中写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一个产业也是如此,在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绿茶、铁观音、普洱、红茶、白茶各领风骚,即使在坦洋茶叶再度兴旺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打的产品也是绿茶。

已是盛夏的中午,晴空万里,阳光更显得火辣。戴着遮阳帽的凌团容刚从茶园除草回来,正坐在村尾的廊桥里稍息。茶园长虫的季节,凌团容一大早从福安赶回村里,二十多亩茶园,整整忙了一个早上。两个孩子分别在上海、北京经营茶

叶,夫妻俩在福安也开着茶叶店,凌团容说自己没认真算过一家的年收入,但一家子经营茶叶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我现在要赶去坐班车回福安了,店里还忙着呢。”

2004年,一份《重振坦洋工夫品牌,再创福安茶业辉煌》的福安市政协委员提案,唤醒了尘封已久的坦洋工夫红茶品牌。

2006年秋,福安市在北京举办坦洋工夫茶新闻发布会,11种以“坦洋工夫”为统一品牌的茶产品同时亮相。

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鸿参与编制了《坦洋工夫红茶综合标准》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坦洋工夫》国家标准等一系列技术规范。在产品改制、工艺创新上也下了很多功夫,现在为许多茶客喜爱的花果香坦洋工夫,就是坦洋工夫红茶守正创新的迭代新品。

二十一世纪,“坦洋工夫”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称号。

2024年,即将退休的刘智勇成为一名乡村振兴指导员,回到了溪坪村,溪坪村是以坦洋村为核心“大坦洋”片区乡村振兴联合体成员村庄之一。联村公司由7个村庄联合出资,分工协作,优势互补,2024年联村公司收入超过了500万元。

坦洋千米长街,福茶馆、非遗文创工坊、宁时光村咖等星星点点分布在街头巷尾。坦洋再次成为周边村庄乡村振兴的“领头羊”。

福安农垦集团董事长苏绍铃每个月都要去几次坦洋,坦洋村的多个项目都由农垦集团运营。农垦集团在坦洋的情意楼有40多个房间,“现在正在装修的是二期项目,年底就将开业。”苏绍铃介绍。

农垦集团是坦洋企村联建的国有企业,旗下的福建农垦茶业有限公司拥有坦洋、高坂、王家等三大国有茶场,茶园总面积4800亩,是坦洋工夫红茶的领军企业。

坦洋茶叶小微园是农垦集团建设的标准化厂房,目的是帮助村里的家庭作坊更上层楼。小微园已有5家企业入驻,原先在村里开着小作坊的林正锦搬进了标准化的小微园,企业顺利通过了SC认证,“与客商签合同更有底气了。”林正锦说。

刘志杰继承了父亲刘少如的茶业、泰和茶行就开在坦洋街上,大姐及大姐夫则在广西横县经营茶叶。

2024年,坦洋村茶叶总产值达1.1亿元,村集体收入213万元,村民人均收入3.61万元。

流池坪山腰,两条观光栈道就在茶园之上。俯瞰坦洋,远处的青绿茶山,近处青瓦黄墙的村庄,流淌百年的坦洋溪,勾画着一个村庄的百年风华。

赶潮的兄弟 (外一首)

□ 汪骥夫

溪流入海的脚步 只需一个潮汐
赶潮的兄弟
你把海天塑成了风景
当第一缕晨曦点亮东方
便有了粼粼波光 和
金灿灿的鱼香

赶潮的兄弟
你耕海牧渔饮马三都港
擎笛锵锵
驱万千气象于浩瀚
揽绚丽沙霞于潮欢
似一道光 掠过
官井洋的渔仓……

赶潮的兄弟
你傲立潮头点阅虾兵蟹将
引“千军万马”欢腾跃翔
你把沃海耕成疆
你把商社挂船帆
让海西风光 在华夏
传唱 启航……

哦启航……
擎笛锵锵……

起点

午夜钟声敲醒晨旦
惊起远山生机灵响

小草驮着露珠凝成霜雾
月亮睡眼惺忪
路边霓虹点缀黄马褂闪烁的汗珠
晨意朦胧
寒风昼夜赶路 摇荡
黎明前第一道风景……

炊烟袅袅冉冉
三更鸡鸣 五更猪嚎
叮铃声掠过鸟巢
批发集市开启市井喧嚣

美味早餐抢滩登场
上学孩童的饥肠陆续被风味美食填满
斑马线上,绿灯久久驻足关注
镶嵌着 另一道
老爷爷护送新星的风景

脚步迟缓挪动着时光
尚有新星在路上 尚有不耀眼的平凡
缀成一串串生活画像
在茹苦风霜的绮角
将一天的希望 开张……



灯下随笔

百福堂记

□ 王石埕

三月的松城,满街的花儿开了又谢,各色花瓣随风飘舞,像是春天漫不经心遗落的胭脂扣。我正敲击着电脑键盘,忽然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惊扰。友人林君,提及有位同乡欲刊印文集,想请我帮忙联系出版社。我本不喜掺和这类琐事,但碍于情面,只得应了。

下午3时整,敲门声准时响起。林君身后立着一位年约六旬的先生,身量适中,一袭素衣,眉目间透着温润的笑意。见我露面,他稍稍前倾身子,声音温润而沉稳:“王老师好,冒昧打扰了。”那语调不急不躁,透着岁月磨砺出的从容。这位便是谢伏清老师了。

他缓缓落座,从随身的包里捧出一叠文稿,那姿态如同捧着一件传家宝。指尖轻抚过纸页边缘,小心翼翼地将文稿在茶几上摊开。谈及家乡柘头时,他的眼眸倏然明亮——“那是座被时光浸润的文化名村”,他如是说。为挽留这份正在消逝的记忆,他特意邀约作家为柘头撰文。他轻声念出几个名字,每个字都沉甸甸的,全是闽东文坛上掷地有声的人物。

林君在一旁轻声补充:“采写文章时往返柘头的车马费、食宿费,都是谢老师从自己微薄的积蓄里,一分一分挤出来的。”



我不禁怔了怔。在这个连情怀都能明码标价的年代,竟还有人愿意为文化倾尽所有。多少人把“文化”二字挂在嘴边,不过是装点门面的脂粉,或是待价而沽的筹码。而眼前这位已退休的老校长,那双布满皱纹的手摩挲着文稿的样子,倒像是在抚摸一个即将远行的孩子——他分明只是单纯地想要为故乡留住最后一记忆的温度。

后来因出版费用太高,谢老师决定只印几本样书。我以为这场关于文字的执着就此落幕,却在一个梅雨初歇的午后,又听见了那熟悉的敲门声。门开处,林君他们又来了。林君在前,谢老师在后头跟着,脚步轻缓。

谢老师缓缓打开一个牛皮纸袋,动作轻

柔得仿佛在安抚一个熟睡的婴孩,生怕惊扰了纸页间栖息的乡愁。茶几上摆着两本刚印好的样书,《文脉柘头》和《红色柏洋》的书名用端正的楷体印在封面上。他摩挲着稿纸,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没有书号,总觉得对不起这些文章……”后半句话化作一声叹息,沉甸甸地坠在初夏潮湿的空气里。

我接过《文脉柘头》,指尖在纸页上轻轻摩挲。那些文字或如清溪潺潺,或似古井深潭,字里行间都是对柘头的深情。林君忽然压低声音道:“《红色柏洋》光是采编就花了3万元。”我心头一震——那可是退休教师半年的薪俸。

我不由望向谢老师:“您家里几个孩子?”

他眼角皱纹舒展开来:“两个闺女,都出嫁啦。”语气里透着满足,倒显得我那句“女儿好啊,难怪能专心做喜欢的事”有些俗气了。

“我再帮您问问出版社。”话一出口,谢老师的眼睛倏地亮了起来,像是有人往古旧的灯盏里添了新油。他第二次邀我去柘头,这次我没再推辞。或许,我真该去看看,是怎样的水土,养出这样执着的文化魂。

隔了些时日,我驱车前往柘头。穿过蜿蜒的山路,远远望见村落卧在青翠山峦间。那是个不大的村子,灰瓦土墙间处处透着经年累月沉淀出的古朴气息。水泥路的缝隙里钻出几茎野草,老屋门楣上褪色的春联纸角微卷,墙角石臼里积着昨夜雨水——时光在这里仿佛走得格外慢些。

谢老师兴致盎然地当起向导,步履轻快地引我来到路口一处园子。这是耕读园。”他驻足在一块苍劲的“拓头”石刻前,语气里透着自豪。大石下环列着34块不小的石碑,宛如一群虔诚听讲的蒙童。细看时,每块石碑上都镌刻着风格各异的“耕读”二字——那是汇聚了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书法名家的墨宝,以铁画银钩续写着千年文脉。

经过谢邦彦公园时,他特意指着说:“都是村里人你五十我一百凑的。”岚坪书院藏在一片翠竹中,推开吱呀作响的斑驳木门,看到有些年代的旧书柜。谢老师抚摸着书柜:“南宋庆元五年,年近七旬的朱熹曾路经潦源(柘头)。”在闽东谢翱文化园,他眼中跃动着希冀的光芒,如同农人俯身察看春日里第一抹新绿。这些承载着文化记忆的场所,虽无雕梁画栋之华美,却在村民的巧手与热忱中焕发出独特光彩——斑驳的木门诉说着时光的故事,古旧的墨砚里依稀还留着先贤未干的墨痕,每一处细节都浸润着乡民对文化的虔诚。移步换景间,但见处处透着化平凡为隽永的巧思,没有奢华的装饰,却自

有一番化腐朽为神奇的雅致。

日影西斜之际,他带着我向百福堂走去。百福堂是一座中式水泥结构的房屋,门楣上悬着一块檀木的匾额,上书“百福堂”三字,笔力遒劲得几乎要破木而出。堂内窗明几净,陈设典雅,大厅正中镶嵌一巨幅百“福”字石刻,使整个空间显得格外庄重肃穆。这些“福”字,或苍劲,或秀润,或古朴,或飘逸,每一幅的笔法都不尽相同。

谢老师如数家珍地为我讲解,指尖轻点着那些墨宝:“这幅‘福’字出自省农科院谢华安院士之手,为求得这方墨宝,我前后奔波八月,三赴省城才如愿;那幅是北大张玉书教授的墨迹;再看这幅,是台湾农民党主席谢永辉的作品……”他目光在字幅间流连,眼中跳动着欣慰的光芒。

我仰望着正厅墙面上整齐镌刻的百福碑文,不禁问道:“为何要费这般周折,集这整墙的‘福’字石刻?”他笑了笑,说:“福是人间至善之字,百福即百善。我想让后人知道,这世上总有人愿意为美好的事物付出心血。”

我忽然明白,他请作家写书、修建文化园、收集“福”字,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留住一些东西。留住的不仅是文字、建筑或墨迹,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对文化的敬畏与执着。

回城的路上,我想起那些尚未付梓的书稿,想起百福堂里那一百个静静守候的“福”字。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还有人愿意为文化的传承如此执着,这本身就是一种福气。

也许有一天,《文脉柘头》和《红色柏洋》终会问世。到那时,人们翻阅书页时,是否会想到那个为它们奔走的老者?是否会明白,有些价值,远非金钱可以衡量?

转过山间最后一道弯,柘头渐渐消失在视野中。但我知道,在那个安静的村落里,百福堂的灯火依然亮着,照着一个老人未竟的梦想。